

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

唐士其

我们已经处于世纪的转折点上。与上个世纪末相比,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那些困扰着人类的问题却一个都没有消失,而且新的问题还在源源不断的产生。贫困与战争、剥削与掠夺、污染与异化一刻不停地向人类的理性乃至人类的尊严发出挑战。作为人类理想的社会主义,到20世纪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但它走过的却是一段跌宕起伏的历史,其间既有辉煌的胜利,也有惨痛的失败,尤其不容回避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70多年后的今天竟然已经不复存在!现实要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也严酷得多,它需要每一个共产主义者作出正确的解释,并且对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给出科学的回答。令人振奋的是,在世纪的暮色降临的时候,人们已经从中国和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一、十月革命——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

十月革命和苏维埃国家的建立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人类社会、政府与经济生活的模式,而苏联的社会经济在此后的几十年中的发展则足以充分显示这一新的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可以这样来概括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那就是它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性,即资本主义发展到某个阶段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则必将极大地解放生产力。

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为人们所熟知,这里将主要探讨这场革命的特殊意义,后者却是长期以来被忽视的。首先应该指出一个历史事实,那就是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之前,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对于即将来临的俄国革命的性质都有一种共同的认识,即它将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换言之,在二月革命之前,即使俄国最有远见的革命者也认为,俄国尚不具备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因为在当时的俄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尚未确立、资本主义经济也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当然,恩格斯的确指出过俄国首先爆发社会主义革命并且不经过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可能性,但一个必要条件是这一革命必须得到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随之而来的革命的支持。

二月革命以后两个政权并存的特殊局面以及临时政府的战争政策使布尔什维克党改变了立场,并且果断地提出了把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十月革命成功了,这是俄国历史发展自然而然的结局,而十月革命之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翘首以盼的就是能够以此引发一场欧洲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以此把俄国革命纳入世界革命的轨道。

但这样的一场革命并没有发生。相反,进入20年代以后,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普遍进入低潮。列宁开始思考俄国革命自己拯救自己的问题。应该说,包括新经济政策、合作制、改组工农

检察院和普及文化教育等等，都与列宁的这种探索密切相关。可以认为，在列宁晚年的思想中，十月革命的普遍性不断地受到它的特殊性的充实。列宁也已经意识到，这实际上涉及到“东方国家”发展道路的问题。

如果列宁的思考能够得到继续并被付诸实践，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很可能会表现出另一幅不同的图景。遗憾的是，作为列宁继承者的斯大林，看来并没有能够理解列宁晚年思想的真正含义。尽管他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但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俄国革命的特殊性。正因此，他简单地把社会主义的建成等同于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又把苏联模式作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标准版本。

伴随着各社会主义国家摆脱苏联模式的过程，十月革命的普遍意义和特殊意义在事实上已经得到了区分。但在此强调指出十月革命的特殊意义仍然不失其必要性。首先，由于十月革命是在资本主义发展相对落后的俄国发生的，所以不应该把它作为考察其他国家、尤其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唯一标准。第二，十月革命开辟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为这些国家在20世纪实现社会主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第三，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东方道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与经典作家建立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经济、政治分析基础之上提出的设想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列宁关于“东方道路”的探索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必要进一步推向深入。

二、分裂的世界——两大阵营及其对抗

国际共产主义在战后迎来了它的第二次大的高潮——社会主义从一国到多国，从欧洲扩展到亚洲和拉美，与此同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与民族民主运动相呼应，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之势。世界形势也随之而表现出一个新的特点，那就是产生了两大阵营和它们之间的对抗。

在经典作家那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主要是一种在逻辑上和历史上前后相继的关系，他们并没有太多考虑这两种制度如何在长时期内并存的问题。列宁提出过和平共处，但显然他对于“共处”的长期性也是估计不足的，所以才同时也有世界革命的思想。从十月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苏联只是帝国主义包围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因而斯大林即使断言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不过他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与西方国家合作，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条件。然而，二战刚结束，同盟即出现裂痕，热战尚未停息，冷战却已拉开帷幕。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逆转，其原因应该说是错综复杂的。除了苏联与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实际冲突之外，两个对立阵营的理论与斯大林关于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思想看来是一脉相承的，联系到他关于“两个平行市场”的理论就更容易理解这一点。如果说一国建成尚有不能坐待西方革命帮助的积极意义的话，那么到提出“两个平行市场”的时候，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中闭关自守的一面就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了。在他的观念中，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完整的自身发展的动力，只要它一经建立，就能够自动地、无尽地创造出大量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完全超越资本主义已经指日可待。既然社会主义没有什么需要求助于资本主义的，那么又有什么必要费力去寻求与他们的合作呢？

当然，不能让苏联单方面为冷战承担责任。但是，两个对立阵营的理论在战后30多年的消极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它不仅数次把世界推向了战争的边缘，而且使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背上了军备竞赛的沉重包袱，最终拖垮了自己的国民经济。至于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这一理论成为压制各国独立自主的依据，由此产生了“有限主权论”、“国际专政论”等等错误理论。1968

年华约国家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就是这一理论的有害实践。

两个对立阵营理论的一个不易觉察的影响也正是它的自身封闭性。尽管中苏分裂之后，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不复存在，但那种“阵营”的观念仍然长期禁锢着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与实践，使之在实际上走上了一条自我封闭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能够正视、学习与借鉴资本主义国家和各种优秀的物质文化成果，不愿意与后者进行交流、合作，从而使自己普遍地错过了战后科技革命带来的机会，重新拉开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距离。所幸的是，冷战最终结束了，其代价是对抗中的一方的巨大挫折。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为解决两种社会制度的国家如何共处这一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这也是一种较为实事求是、较为有希望的思路。

三、阵营内部的冲突——共产主义还是民族主义？

社会主义阵营从其诞生之日起就远非铁板一块。在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围绕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是十分复杂的，有的甚至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其中既有象中苏论战那样震惊世界的口诛笔伐，也有象波匈事件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那样的流血悲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矛盾不过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从而也将随着后者消亡而消亡，因此无产阶级的国家之间只应该有亲密无间的合作。这也是列宁的思想，列宁甚至设想所有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国家随即将突破国家的界限，加入一个共同的社会主义的联盟。正因此，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取名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而没有任何地理和民族的限定。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样的认识过于简单化、也过于乐观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西方人习惯于称之为“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抗”，这实际上也是苏联人自己的看法。这种判断的一个根本错误，就是把苏联的理论和做法称为共产主义，而把与之冲突的观念与尝试称为民族主义，这就严重混淆了问题的真象。

当列宁为了捍卫俄国革命而批驳苏哈诺夫等人的观点（其中存在某种欧洲中心论式的东西）、并明确提出“东方道路”问题的时候，可以把列宁也称为民族主义者，更不用说他为了保存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力排众议，主张签订《布列斯特和约》了，因为他相当明确地在捍卫俄国革命的利益，简单点说也不妨称之为俄国的利益。问题是，这种民族主义是一种与共产主义相对立的东西吗？

只要对构成列宁的“民族主义”观念的那些基本因素进行一点粗浅的分析，这个问题并不难回答。这些基本因素就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导致了俄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特殊性，既然这种带有“东方”色彩的革命和建设是俄国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俄国人民的利益所在，那么在这里，教条式地照搬经典作家的论断，强调西方道路的正统性就是不能被接受的。可以看出，这样的“民族主义”不仅不与共产主义相矛盾，而且是后者必须的具体的表现形式。

一个民族不仅有其现实的物质利益，而且拥有自己的历史，而前者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为后者所制约的。正是这种历史决定了一个民族特定的文化、特定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与交往模式，也决定了它特定的利益认定、利益分配与利益实现的模式，从而最终决定了它的命运。正因此，即使是某种对各个民族而言共同的利益，在不同的民族那里，也将必然有不同的表现，因而它们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必然要遵循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与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与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并没有丝毫的冲突之处。对于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是理解最深的，所以当西方人问及周恩来首先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还是民

族主义者的时候,他能够毫不犹豫地回答:“我首先是一位民族主义者”。

不能正视民族问题的恶果是双重的,即既不能尊重各民族对自己的发展道路的选择,也不能正确对待本民族身上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而是想当然地把它视为一种超越民族范畴的东西。苏联在国内民族政策上的错误自然也被带到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去。这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和冲突的本质。对于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而言,这乃是一场探索和捍卫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斗争,而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利益的冲突,虽然这两者往往也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没有、或者被压制而不能找到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结合点,恰恰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关键的原因。

四、发源地的困惑——世界“另一面”的变化与斗争

十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党人所盼望的西欧革命的高潮不仅在列宁的有生之年,而且时至今日也没有到来。相反,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国家虽然经历了又一次更加惨烈的战争,以及二、三十年代空前的经济萧条的折磨,但是,借助于战后新技术革命的推动,这些国家的发展又迈上了一个新阶段,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它们的社会经济也还有相当的潜力。

可以肯定,西方国家社会主义运动长期处于低潮,其原因一方面是一些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就是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普遍存在的教条主义,它们严重地忽视了这一发展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带来的种种变化,而后者又与苏共的影响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苏共在与西方国家共产党关系问题上的错误也是双重的。共产国际成立之后,苏共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实际领袖,后来共产国际虽然解散了,但苏共对后者仍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一方面要求西方各国共产党把苏联模式奉为社会主义的样板,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它们根据自己的处境灵活地调整自己的战略策略。但是,苏联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等等与西欧的传统以及人们的日常观念根本不相符,更何况象苏联的强迫集体化和肃反扩大化已经给这一制度带来了严重的阴影。西方国家共产党按照苏共要求提出的纲领政策对本国人民而言很自然地显得是一种外来之物,在某种意义上甚至还带有恐怖的色彩,从而无从得到广泛的支持与拥护。另外,在苏共的影响下,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一方面只把注意力集中在产业工人身上,另一方面又把苏共的一些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自己的党内,从而使它们日益孤立于由新技术革命带来的不断壮大的白领阶层。长时期内,在这些国家,传统的产业工人往往是共产党的支持者,而广大的白领阶层却成了社会党的基本选民,造成这种分野的基本原因就在于此。

看来,西方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要有一个大的发展,势必要求这些国家的共产党极大地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对自己的纲领、策略以及组织方式进行全面的调整,否则它们将落后于时代。当然,这种调整应该在原则界限内进行,而不是放弃共产党的本质特征。苏东剧变之后,西方国家的共产党纷纷社会党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通过以上的分析也可以看出一部分,但我们最好不要过早作出判断,而是把它视为一种探索。

五、改革开放与“和平演变”——两条道路与两种结局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与苏联东欧的剧变,是20世纪90年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同样引人注目的两件大事。应该说,这是改革开放与“和平演变”两条不同道路所

带来的两种不同的结局。

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传统体制的潜力发挥殆尽,进入70年代以后普遍陷入了经济停滞的困境。与此同时,高度集权的传统模式所带来的官僚主义与腐化现象也十分明显地暴露出来,人民群众因其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提高而产生的不满情绪越来越严重。中国1976年的“四·五”运动,波兰从70年代中期开始的工潮,以及苏联东欧各国普遍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都是对这一形势的反应。在苏联东欧,由于与西方交往的客观存在,西方国家在战后的迅速发展以及东西方差距从70年代以后的重新拉大,更加剧了人民群众与现行体制的对立。社会主义要生存和发展,改革势在必行。

80年代的改革浪潮冲击了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一场深刻的革命。但历时不久,这些国家的社会政治进程就表现出迥然相异的两种不同的方向,苏联东欧迅速地投向了资本主义的怀抱。这的确是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受到的最大损失,而且也给这一运动带来了思想和理论的混乱。所幸的是,这种混乱持续时间并不长,在一些基本问题上,人们逐步得出了一致的结论。

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与苏东剧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与实践及其世所公认的成就是在20世纪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伟大贡献。当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也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它同样既面临着西方“和平演变”的压力,也面临着国内“左”右两种错误思潮的阻挠和干扰。无论如何,中国的改革开放毕竟是一步一步地稳定地向前发展了。改革开放的进展同时也就伴随着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认识的深化。中国共产党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地认识到以下这么一些原则: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贫穷绝不是社会主义;第二,社会主义只有在不断的改革与完善的过程中才能向前发展;第三,社会主义必须建立在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的基础之上,闭关锁国绝对建不成社会主义。第四,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可以说,正是这些原则构成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理论根据,它是几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的科学总结。

全面地看,可以这么认为,虽然苏东剧变给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但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却表明,这一运动经过挫折,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正在走向成熟。因此,这种改革不仅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得到广泛的认同,而且也得到西方国家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理解和尊重,那种认为这些国家很快会步苏联东欧后尘的思潮正在失去市场。

六、社会主义——人类的希望

在展望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的时候,首先是不能把苏东剧变视为社会主义本身的失败,更不能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的胜利;另外,在承认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遭到了挫折的同时,也要充分看到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理论和实践对社会主义运动作出的发展。实际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至今还不到150年,与人类任何社会制度的历史相比,就可以发现社会主义只是刚刚走出它的童年,还远远谈不上成熟,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与挫折在所难免。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密涅瓦的雄鹰只是到黄昏才开始飞翔。任何匆忙的结论都未免肤浅而且幼稚。

社会主义运动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所以只要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得不到解决,社会主义运动也就有其存在的理由。另外,社会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的这种关系也就决定了前者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必须伴随着后者的变化而不断地调整和发展,在这里任

何的僵化与教条在本质上都是对社会主义运动本身的悖反。因此,需要的不仅是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的信心,而且还必须根据资本主义的变动及其新的矛盾,为社会主义运动找寻新的发展方向。

当前,西方国家社会经济的相对稳定发展以及社会主义运动的相对低落是对这一运动的一个严峻的考验。实际上,虽然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一直没有改变,但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却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地改变形态。另一方面,社会主义运动也不应该是一种抽象的运动,它必须在与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具体矛盾的斗争中不断地走向发展和壮大。20世纪资本主义在取得了相当的发展的同时,各种具体的矛盾却不仅没有减少,而且日益复杂和日益尖锐化了。当前,在西方国家内部种族冲突加剧,极右势力抬头,各种社会犯罪不断增加,人们的道德水准不断下降,非意识形态化、非政治化乃至非道德化成为普遍的现象,致使越来越多的人有一种末世之感。就是在经济领域,西方各国也在经历了战后的黄金时代以后不同程度地陷入了滞涨并存的陷阱而不能自拔,从而给这些国家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浓厚的阴影。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环境的污染、战争的威胁以及第三世界的贫困化都对整个人类的生存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明显,这一切问题都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和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资本主义逻辑所无从解决的,它迫切要求各国的共产党人作出自己的回答,也只有他们才能作出正确的回答。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经过挫折之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并且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是人类的未来。

纵观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轨迹,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基本的结论,即它经过汲取成功的经验以及失败和挫折的教训,已经告别了自己的童年,并且开始走向成熟。它已经摆脱了对自身简单化的、教条化的和模式化的理解,开始在各种复杂的、具体的联系和运动中,以一种对历史和对现实的开放的视野来把握自己的任务和运动的未来。在此应该充分肯定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在世纪之交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虽然这不是本文的重点,但正是它的理论精髓构成了本文全部分析的背景。我们认为,它真正代表了一种新型的、成熟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作为结论,可以说在20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已经为走出低谷,迈向新的未来准备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当然,这一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取决于每一个共产主义者,每一个国家的共产党的努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博士生)

[责任编辑 姚 彤]